

【短史记】

柳宗元锐评医德医风

□刘永加

医药问题和医德医风古来有之。唐代官员、散文家、诗人柳宗元就曾以求医问药的亲身经历与体验感受，写下自己的批评和表扬意见，给今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医药史料。

在唐长安的日常生活中，生老病死一样是常态，那时生病了也要求医问药，长安街头开药铺行医的店家也不少，但是良莠不齐，有时令人真假难辨，难免上当受骗。

柳宗元在长安做官时，就有过这样的经历：有一次他突然患病，腹部胀闷不舒，心慌。医生诊断后开了茯苓，让他回家买药煮汤服下。柳宗元在一家药店买了药，回家煎煮后服下，谁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，反而加重了。柳宗元让人把医生喊来，讲明他服药不但无效，反而病情加重的情况，问其原因。医生看了药渣后说：“您煮的是芋头，不是中药茯苓，一定是卖药的人为了赚钱用假的来欺骗您。”

柳宗元这个气呀！一般人也就不自认倒霉，顶多找到卖药人讨个说法。但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想到不能再让更多的人上当受骗，于是撰写了一篇《辨茯苓文并序》，文中写明茯苓的功效，以帮助百姓辨别茯苓真伪，并将自己上当受骗的经过如实写出来公之于众，以此警醒大家。

柳宗元在这篇文章的序中写道：“余病瘡且悸，謁医視之，曰：‘唯伏神为宜。’明日，买诸市，烹而餌之，病加甚。召医而尤其故，医求观其滓，曰：‘吁！尽老芋也，彼鬻药者欺子而获售……推是类也以往，则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人者众矣，又谁辨焉！”接着他在正文中写道：“今无以追今，后慎观之。物固多伪兮，知者盍寡。考之不良兮，求福得祸。书而为词兮，愿寤来者。”

柳宗元对不法药商毫不留情地给予曝光，就是在反思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，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再上当。只有都较真起来，对假药人人喊打，才能使之畏惧，从而彻底消灭假药坑人这一顽疾。

正因为柳宗元有了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他对那些诚信经营的医生、药店特别推崇。宋清是长安一家药肆的老板，因诚信经营而出名。他在药店储藏的都是好药材，许多药农感于宋清的为人，采来并制好中药材，一定要送到宋清的药肆，宋清也不亏待这些药农，都按高价收购。同样，长安的医生也喜欢用宋清药肆的药来配药方，因为治病效果好。

平时，宋清总是很热情地接待每一位客人，有的病人缺钱或是忘了带钱，宋清也会把药先赊给他们，为此宋清家里积攒了很多欠条，他从来没有上门去索取药钱。有些素不相识、从外地来的人，他照样给打欠条。每到年末，宋清估计有些人的账是没法还上了，就把其欠条烧掉。其他的商人对宋清的举动很费解，嘲讽他“是个蠢人”，当然也有人认为：“宋清大概是那种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吧！”宋清听过这些议论，坦然地说：“我经商赚钱养活妻子女，道德高尚还谈不上，但要说我是蠢人，也是不对的。”

就这样，宋清在长安卖药四十年，先后有一百多人的欠条被烧掉，其中有后来做大官的，有管辖州郡的，他们派人给宋清送钱

送物，接踵而来，宋清家门槛快被踏破了。除欠宋清药钱至死没还的约有千人，但宋清最终照样成了一个富翁。史载，唐贞观年间名将尉迟敬德，也曾 在宋清药肆买过药，可见宋清的药肆在长安影响之广。

对于宋清不卖假药、救济贫困的做法，柳宗元深有体会，所以他很是感慨：“清居市不为市之道，然而居朝廷、居官府、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，反争为之不已，悲夫！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。”尽管后来柳宗元从京城被贬到几千里外的永州，仍然念念不忘京城这位叫宋清的模范药商，专门为其写了传记《宋清传》，以弘扬宋清这种优良作风。

宋清的事迹在唐代一些史书也有记载，可见不是柳宗元杜撰。据《唐国史补》载：“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，朝官出入移贬，清辄卖药迎送之；贫士请药，常多折券，人有急难，倾财救之。岁计所入，利亦百倍。长安言：人有义声，卖药宋清。”

像宋清一样的药行、药肆、药市，在长安大都分布在东、西两市。当时的诗人张籍曾在长安生病，亦有治病买药的经历，对一些药商坐地起价的行为很是憎恨，就曾写过《赠任道人》诗：“长安多病无生计，药铺医人乱索钱。欲得定知身上事，凭君为算小行年。”

长安东西市包括药肆在内的商家很多，据日本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记载，会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，“夜三更，（长安）东市失火，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，官私钱物、金银绢药等总烧尽”。这次被火烧掉的药行、药肆的药材有很多，所以药商损失很大。同时圆仁还提到唐皇帝曾安排人到东西市寻觅合适的药材，可见药行、药肆是经政府承认的，是合法的商品经营场所。

当时长安药肆经营的药材品种不少，有的药肆经营熟药，即中成药，在西市就有卖饮子的药家。在《太平广记·田令孜》中记载了卖中成药饮子的情况：“长安完盛日，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，用寻常之药，不过数味，亦不闲方脉……常于宽宅中，置大锅镬，日夜剉斫煎煮，给之不暇。人无远近，皆来取之，门市骈罗，喧阗京国。至有赍金守门，五七日间，未获给付者，获利甚极。”除了熟药，有的药肆还经营生药，白居易诗歌中“长安药肆黄蓍贱”中的黄蓍即是一种生药。

长安药肆的药材采购途径，从资料记载来看，主要有两种：一是来自专门种植药材的药农，以及《宋清传》中所说的“有自山泽来者”，即从山川河湖采摘中草药。第二种途径就是进口药材。据《唐大和尚东征传》一书记载，八世纪中期广州进口外国药材的盛况空前，“江中有婆罗门、波斯、昆仑等舶，不知其数，并载香药、珍宝，积载如山。”这些从广州进口的珍稀药材沿途贩运，一直运送到京城长安的药肆。

正是有了宋清这样的药肆，以及中草药材来源渠道的保证，长安居民就医买药的需求才得以保证，得到柳宗元这样大文学家的表扬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同样也要为柳宗元批评不法药商的做法叫好，在治理医药问题、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方面，舆论监督自古就不曾缺席。

□刘俏到

明朝嘉靖三十八年正月，34岁的王世贞自青州北上台谒，至历城拜访毕生挚友李攀龙。此时王世贞自刑部外放山东近三年，李攀龙辞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、隐居白雪楼逾两年。王世贞后来谈到，自己的到访让李攀龙万分欣喜，家境贫薄的他特地“烹一豚”“出蟹胥佐醑苦”。两人坐而论诗、长饮终夜，“尽一甌苦、五十六螯”，想来应是相当尽兴。

李攀龙，字于鳞，号沧溟居士，济南府历城人。王世贞，字元美，号凤洲，苏州府太仓州人。两位刑部同僚于十多年前订交，彼时李攀龙遥追“前七子”之首李梦阳，“诗文诸体皆追溯古源”，王世贞与之颇有共鸣、相处甚洽。两人遂与刑部诸士结社共盟、交游赋诗，成为明代中叶文坛“后七子”领袖。

真文人往往有个性。“后七子”一旦结盟，其力倡古文辞而不拘流俗的张扬姿态，迅速招来种种非议。又值严嵩当政，王世贞与刑部诸士绝不依附权臣，还在著名的“杨继盛案”中施援善后，这些都被严党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。因此，李攀龙等“后七子”被陆续安排出京任职。

李攀龙先是外放河北顺德，三年后去陕西就职。当时陕西巡抚是山东人殷学，两人一个挟势倨傲、一个恃才自傲。殷巡抚听说李攀龙文章写得 好，于是“下檄于鳞，代撰奠章及送行序”。“檄”是下行文书，李攀龙视为侮辱，“文可檄致邪”？意思是文章可写，但不能命令我写。而殷巡抚仍然坚持要摆领导的谱，李攀龙就说：“彼岂以我重乞官耶”——我才不稀罕当这官呢，立刻辞官归故里，连吏部的批复都不再等。

李攀龙辞官前，王世贞曾加以劝阻。但对李攀龙来说，辞官是他更高精神追求的开始，决心不可更改。不过，他在王世贞建议下，于历城王舍人庄东北隅修建了鲍山南楼，后称白雪楼。从此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，“海内学士大夫，无不知有沧溟先生”，而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王世贞的来访，自是相当重要的一次。

只不过，潜藏在这新年喜庆之下的暗流，却是帝国朝政的尖锐斗争。“杨继盛案”以来，严嵩一党与反严势力水火不容。李王白雪楼夜谈四个月 后，王世贞之父王忬因战事失利，受严党构陷落狱，多年来王氏家族与严党结怨的矛盾全面爆发。次年十月王忬遇难，王世贞遭遇人生大劫，携弟扶丧南归。经运河路过济宁时正值寒冬，李攀龙自白雪楼单骑长驱四百里，吊唁挚友父丧，“真凛凛有古人之壮节”。须知王忬死难前后，诸士多避而远之，唯恐被严党惦记。

王世贞回到老家太仓，先为父居丧二十七个月。他自认“天地大罪人”，基本息绝交游，独与李攀龙等至交好友保持书信往来。三年后他脱下孝服，慢慢与周边及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士交往频繁，恢复和织密自己的朋友圈，延续当年刑部“后七子”结盟、独树文坛一帜的声望，也

正好以诗酒“畅怫郁，浇磊块”。当年王世贞在青州任职，曾与群贤戏言“愿得二顷水塘，作园居隐”，如今他有了机会。父丧除服之后，嘉靖四十五年秋季，他购得太仓隆福寺西侧一片土地，开始打造一个安静的私园，后名弇山园。随后二十年里，他的私园不断拓建，终成七十多亩的泉石花竹之盛，与更晚建成的沪上豫园比肩东南。

王世贞南方筑园之时，李攀龙又在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筑楼，这就是四面环水的“湖上白雪楼”，往来之客只能舟渡入门。白雪楼本指阳春白雪之楼，当然只接待阳春白雪之士。清人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记载，楼前若有俗客临门，李攀龙会高卧不出；若有文士到来，则“先请投其所作诗文，许可，方以小舫舫渡之”，看不上的就称“亟归读书，不烦枉驾也”。

就在这一年，嘉靖皇帝驾崩，朝野形势骤然变化。此时严党早已倾覆，一批忠臣志士回到前台。隆庆元年十月，李攀龙走出白雪楼赴任浙江按察副使，十二月途经苏州时，与王世贞相聚。多年风波过后，如今感慨无限。按李攀龙说法是与王世贞兄弟“雄饮姑苏三日夜”。

复出三年后，58岁的李攀龙因病逝世。李攀龙在世之时，达官显贵以其接见为荣，学人士士以其品评自嘉，因此“闻望茂著”“操海内文柄垂二十年”。李攀龙离世后，王世贞接

过文学复古大旗，“巍然崛起东海之上”，继为一代文史大家。此时弇山园已初具规模，成为白雪楼之后又一文人雅士聚集之地。不过，与李攀龙高隐白雪楼的姿态略有不同，晚年的王世贞变得恬淡随俗，声称园林之盛“当与人人共之”，得闲之时便与普通游客同嬉于私园。也可能正是这种心态，让更多普通文士得到了他的扶持庇护。

回想当年白雪楼的李王夜谈，其主要内容当然不在叙旧，而是推心置腹的“评榷”文学。自京师结盟以来，两人终有机会以更加理性的心境共同反思十多年来结盟复古的得失、探讨今后文盟的延续。不过并不起眼的夜谈，毫无疑问对随后两人及明代中叶的文坛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文学观点未必全盘认同，但对其人一生尊崇。李攀龙离世后，王世贞先在隆庆年间将其诗文会集三十卷、刻印行世，又在万历年间点校遴选、重新刊行，作为对至交好友不可忘却的纪念。晚年王世贞还多次为李攀龙写下感怀诗文，委托北上的同乡过访其冢，更对李攀龙的后代和门人关照有加。有一年，王世贞于弇山园作文以祭李攀龙，文中告以身后事及同道诸士、家人近况，并以“专至且鲜，兼工独汝”八字为其盖棺论定。

从白雪楼到弇山园，在古代文人营楼造园的雅兴里，见证着明代中期文学复古的一段小历史，更得以窥见李王二士志同道合、绵延毕生的真挚友情。

【人文地理】

从白雪楼到弇山园

